

香港文学:在喧嚣市声中静静开放

□徐 可

香港文化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生态,它似乎没有轰轰烈烈,但是始终默默地融入香港人的心灵。香港文化人对文化的坚守、特区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香港文化活动的丰富、香港人对文学艺术的热忱,都令人印象深刻。一大批执著的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一直默默地坚持创作,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近年来都保持着比较整齐的水平。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香港文学就像繁华街道路边的景观花一样,虽然没有花团锦簇、浓香袭人,但是一路绵延不绝,幽香淡淡,为水泥森林增添生机,为劳碌众生提供慰藉。

商业社会里的默默坚守

追溯香港文学源头,大多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包括许地山、欧阳山在内的大批知识分子来到香港,一边创作,一边培养文学青年,组织文学活动,促进了香港文学的发展。1949年之前,有过三次大的内地作家来港潮,分别是1927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和1946年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后。这三次内地作家来港潮都推动了香港文学的发展,使香港文学空前活跃和繁荣。在后来作家的带动和培养下,香港作家也迅速成长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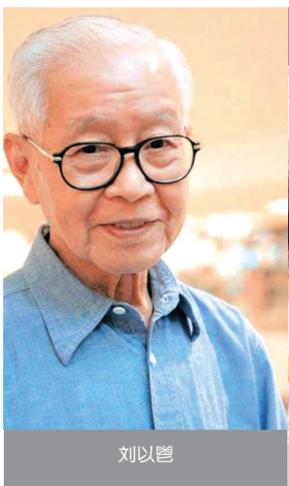
有人认为,香港的作家队伍呈现两个“四代同堂”的景象,即本港作家四代同堂和南来作家四代同堂。无论是本港作家还是南来作家,都是香港文学的主力军。这四代作家中,第一代已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健在的作家如刘以鬯等,仍然关心文学事业,热心文学活动,在文学界起着旗帜作用。现在活跃在香港文学界的,昆南、陶然、董桥、小思、西西等老一辈作家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笔耕不辍;董启章、陈娟、王璞、蔡益怀、王良和、罗贵祥、韩丽珠、萍儿等中青年作家,以更开放、更新颖的形式探索着香港文学的未来趋势。

香港作家都是业余创作,虽然身处商业社会,但是不少严肃作家,淡泊名利,坚守文学理想,坚持文学创作,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和虔诚令人感佩。正是有这么一代代作家默默坚守、薪火相承,香港的文学事业才能长盛不衰,香港的文脉才能绵延不绝。

特殊环境下的文学生态

尽管研究者对是否有“香港文学”这一概念持有不同看法,但不可否认,香港的文学创作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学的特征。一方面,由于长期与祖国分离,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浓郁的地域性形成了独特“港派风味”的现代都市文学品格;另一方面,它又深受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影响,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兼容并蓄,流派纷呈;香港文学还有商品化和快餐文化的特征。

香港文学的地域特色,“港派风味”是逐步形成的。上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南来作家的创作在香港文学中占据重要位置,香港文学的地域特征并不明显。到50年代末,随着当地作家队伍的壮大,年轻一代的香港作者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大多都受到“五四”新文学的熏陶,又有深切了解。他们的创作以生动的生活气息和浓烈的地方色彩而区别于南来作家,着力描绘香港社会生活图景,而南来作家也转为面向香港现实,使香港文学日益确立自己的特色。随后出现的反映下层社会人



刘以鬯



董桥



董启章



韩丽珠

情风貌的“乡土小说”、揭示商业城市种种矛盾的“都市小说”和表现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变态形态的现代派作品,进一步使香港文学的地方色彩更加丰富而独特。

香港的文学创作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受到了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早在上世纪5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就在香港兴起。一批作家将现代主义与香港现实相结合,写出了大量成功的作品,如刘以鬯的现代小说,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运用西方现代小说形式,讲述香港的、中国的内容。他的长篇小说《酒徒》,是中国最早采用意识流手法的长篇之一,以现代香港为背景,描写了因处于苦闷的时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识分子怎样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继续生存,有很强的现实感和社会性。

在香港,一些文人为了谋生,不得不迎合市场需求,大量制造市场需要的通俗文学作品,这是消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规律也对香港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它促使严肃作家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更加认真地对待创作。

香港副刊文化向来发达,“专栏文章”更是一种相当鼎盛的文类。过去几十年来,不少文人作家都曾受惠于报纸的文学副刊。现在,作家们还是喜欢在报刊上开辟专栏,相当一部分作品是通过报纸副刊、专栏与广大读者见面的。很多专栏作家都是有名的作家,内地读者所熟悉的董桥就是一位优秀的专栏作家,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报纸副刊或专栏上首发的。董桥的文笔雄深雅健,兼有英国散文之渊博隽永与明清小品之情趣灵动,在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自上世纪70年代末出版《双城杂笔》至今,董桥已推出几十部作品。虽然董桥已年逾七旬,但仍然笔耕不辍。他在报纸上设有固定的专栏,每周一篇。据董桥自述,他的专栏文章每篇都是经过反复修改,字斟句酌的,绝没有敷衍之作。作家陶然、潘耀明、刘绍铭、林行止等,也

都长期在报纸上开设专栏,副刊和专栏在香港文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与民间的共同推动

文学是少数人的事业,但是文学的发展则离不开全社会的关注与参与。作家创作,文学发展需要适当的物质基础。作家可以甘于清贫,但是文学事业的发展光靠作家甘于清贫还是不行的,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合力支持。

香港特区政府在推动文学事业发展方面可谓功不可没。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在推动文学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是加大了对文学事业的资助力度。特别是在香港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而陷入低谷的情况下,香港艺术发展局对文学事业的资助不减反增。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委会规定,资助作家出书,凡中篇以上作品,均需经文评员评审考核后方可交文委会定夺,这使资助出版更加规范,保证了资助出版物的质量。文委会对资助报纸办好文学副刊尤为重视。例如,1998年6月,文委会通过“资助报刊文学版”一案,拨款60多万元,资助一批报刊扩充文学版。香港的一批纯文学刊物,如《城市文艺》《文学研究》《读书人》《当代文艺》《香江文坛》等,也是由政府资助出版的。从年度拨款来看,回归之后比回归之前有大幅度增加。

其次,积极举办文学活动。每两年一次的“香港文学节”,已经成为香港文化活动中品牌,每次活动都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包括专题展览、研讨会、文学讲座、作者与读者对话、中学生“文学作品演讲比赛”等等。每年的“香港书展”是香港人的文化盛宴。很多作家的新作都会在书展上首发,两岸三地的作家应邀举行讲座和作品签售活动。另外,几乎每年都有多种类型和主题的国际性文学研讨会召开,新的文学类杂志纷纷创刊,设立并评选国际性文学大奖。

许多热心公益和文学事业的人士也为香港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支持。他们资助出版文学书刊、文学社团和文学活动,例如香港作家联合会的经费主要来源就是热心人士的捐助。

香港有不少文学社团是纯民间机构。最有影响的是香港作家联合会(简称香港作联)和香港作家协会(简称香港作协)。香港作联成立于1988年,创会会长是曾经担任过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的作家曾敏之,现任会长为潘耀明。香港作协拥有丰厚的文学资源,旗下集合了众多作家、诗人,如刘以鬯、曾敏之、陶然、黄维梁、吴羊瑾、黄庆云等。香港作协成立于1987年,首任会长是作家倪匡。这些文学社团踊跃举办各类文学活动,如文学讲座、研讨会、笔会、诗朗诵会、征文比赛、文学奖评选、文学成就展览等。香港回归后,此类文学活动更加频繁,并积极与内地文学界沟通,邀请内地作家赴港交流。各大大专院校青年学生组织的文学社团也时常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学活动。文学活动不仅为作家交流学习提供了方便,还起到了鼓励青年学生从事文学创作、在各阶层市民中扩大文学影响力的作用。

香港各大学的华文文学推广和创作活动也十分兴盛。香港浸会大学于2006年设立了“红楼梦文学奖”,奖金30万港币,是迄今为止华文文学中奖金最高的奖项。另外,开设“国际作家工作坊”,建立驻校作家制,邀请海内外作家到香港进行创作和讲学交流,也有益于香港文学的发展;香港城市大学设立“中国文化中心”,邀请海内外作家开办讲座,弘扬中华文化;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世界大专院校文学征文奖”,以鼓励和促进青年的华文创作。

总之,香港并不是只有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更不是什么文化沙漠,香港文学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和鲜明的特色。香港作家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忠诚,令人钦佩,值得学习;香港特区政府和民间人士在支持文学事业发展方面的一些做法,更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绿蒂诗集《四季风华》

美神在四季徜徉

□张同吾

诗人绿蒂是我相识多年的朋友,2000年我访问台湾,他日日相陪,从台北到日月潭、到阿里山、到高雄,一路倾谈,他热爱祖国的深情和他对诗的痴迷,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令我感动。返回北京不久我读到他的诗集新著《风和捕手》。这是一部近作与以往佳作的合集,充分表现出他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个性。他长于营造优美的意境,笔触婉转细腻,却又饱满绚丽的色彩,描绘出一幅幅格调高雅的图画。他的灵感时时涌现,在诗人随意俯拾的诗句中可以感觉到,他的意境优美灵动,在变幻的色彩中流动着气息,视觉和感觉浑融,构成了诗人主观感受的具象。他的许多诗篇都出现静谧的月夜、飘动的云彩、清幽的竹林、萧瑟的晚秋、皎洁的初雪、缠绵的细雨、美丽的山岚、啾啾的鸟语、飘落的红叶、渺茫的苍穹、淡远的夕阳、凄迷的晚钟,蕴含着淡淡的忧伤,构成了他全部诗歌作品的主体风格和基本情调。



绿蒂

时隔14年,绿蒂长达近600页的诗集《四季风华》又在台湾出版。仍是婉约之风,仍是凄迷之美,他写寺院山色、梅香海晏、月朗星疏、细雨微风、华灯初上、夕阳渐冷、梅秀幽远、中秋月朗、高原冰雪、花圃春光、波上云烟、雨后彩虹、惟妙惟肖,诗语盎然。“头顶的新月/掀开微蓝的天幕/淡白地张贴在晨光的告示板/远方破云而出的朝日/在渐次蔚蓝苏醒的海上/映画出一道金灿灿的长廊”(《晨光素描》);“顶着金黄屋瓦的八角造形/以极简单的廊柱/撑开四面的阳光/吐纳八方的风雨雨势/亭立宏明山翠绿的棧线/呼唤太平洋迎面的浩淼”(《纳风亭素描》)。两种素描都是色彩绚烂,前者精微细柔,后者开阔辽远,都表现出诗人目光所及、心象延展的表征。绿蒂以绚丽的色彩描绘景象,而他的色彩是流动的、变幻的,“在湖的千岛/看千岛的湖/是一面面绿的、蓝的、或金色的流溪/是一面以水纹与风安织成的图案/波光掩映/湖浸染成深秋的画卷”(《千岛之湖》)。目光随着色彩的变幻而流动,形成了动静相生的美感。

绿蒂的诗歌意境中,不仅包含着缠绵的情思,也包含着历史感和文化内蕴。他说,“风化了三千二百年的岩石/依然坚持地撑起/王朝盛世的国拱大门/走入亚历山大辉煌的记忆/走在光滑的大理石板路面/阳光是荣耀的金黄披肩/石柱的阴影/是我另一种旁观的选择//所有游客的年龄/在此年轻/所有访者的思想/在此现代/微笑正以世界语言/混浊着各色人种的习性/让古城思索辨识未来”(《在微风的古城向晚》)。他以意向的多指向,拓展了诗意的空间,让读者去思索存在意义的多重性。《和南寺钟声》,让他感到是“蝉声与禅声/鸟语与诵音/混成野百合的清香的午后/寺院飞檐掩映天降的湛蓝”,“暮鼓的节奏/摇动追梦的心思/晚钟的回荡/唤醒孤寂的无常/山风籁籁垂落的/是远方乡愁的声音”。禅声鸟语含有神悟,晚钟暮鼓思乡情重,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文

化心理,他表现得细柔而深邃。“从古老的唐宋/从遥远的洞庭/七弦琴音款款走来/褶皱了湖面的闲云/倒映着雁行的晚秋”(《洞庭秋思》);“来自千年古琴的朴拙/来自诗人文采的流觞/今夜的旋律/不讲哲学/不讲神话/只有节奏谱成的铿锵”,然而就在诗人的感悟中,既有哲学又有神话,他已感悟到“风翔千仞”的自由,探幽到“桃源春晓”的迷踪,从而在《永远的忆念》中抵达心灵的圣境。

在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描述中,多有人生感悟和哲理思辨,他说,“生活是一步步的/永不回头的攀登/不知通往何处/不知哪步即是无涯深渊的/云上之梯”,“未曾拥有/何来失却的黯然/自掌握回/陈溜过的/只是风/即兴的心动或偶拾的盎然”(《云上之梯》)。老庄哲学关于“有”与“无”的辩证关系,已成为诗的底蕴。既然“在收纳柜中/时间的封印/让陌生的成为熟悉/让粗糙的成为圆润/惊涛平为静浪/愤恨释为宽容/所有浓稠的欢笑与苦难/稀释为流动的回顾之河/不见封闭囤积的悔恨/岁月的仆仆风尘/依然轻盈承载”(《往事的收纳柜》)。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仁道与宽容,而且是在时空转换中一切暂时性都会在永恒中消融。因此,人生何尝不是时间的过客,“来如春临/没为山城装饰我期盼的风景/去如晨风/群山翠峦也阻挡不住的涌雾”(《午与夜的十四行》)。读者调动自己的经验与阅历,会感到余韵深长。

绿蒂的诗最突出的美学特征就是美的情思、美的色彩、美的词藻、美的意境,好像美神在四季徜徉,泼洒出五彩缤纷的花瓣,让绿蒂的诗歌园圃风情万种。当然,他的诗读多了也略有重复和雷同之感,往往是相同的构思、相同的词汇、相似的意境。假如有更新颖的切入角度,更新鲜的审美发现,就会有更美的魅力。

《海外新移民作家访谈录》:“一代飞鸿”雁归来

□陈瑞琳

江少川的《海外新移民作家访谈录》仿佛是一面大时代的“镜子”,这“镜子”里面的人如此清晰,如此鲜活,他们在当代文坛留下了最真实的声音,保留下一份最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镜子”里的人在文学的道路上大都走了近30年。2002年10月,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我第一次代表海外的新移民作家重返祖国,见到了江少川,他是长江流域最早从事港澳暨海外文学研究的学者,曾出版《台湾文学教程》《港澳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台港澳卷)》《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等著作。多年从事高等院校讲坛及科研工作的丰富经历,使他深感第一手研究资料的珍贵。近10年来他呕心沥血采访海外新移民作家,用心良苦,独到的学术眼光令人敬佩。

海外华文文学虽然不是“显学”,但它的学术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地扩展。向外,它传播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向内,它挑战性地引进海外文化。

说到海外新移民文学的成长,推动的背景正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百万大军乘桴于海,移植到异国他乡。他们带着自己纷繁各异的经验扑入全新生活环境,创造出新一代的华文文学。面对这道独特奇异的文学景观,江少川认为,新移民作家先是在中国生

长,后来生活在异国,他们所具有的双重生活经验、两种文化背景以及双语能力,决定了他们的写作与原乡、异乡的文化不可分割;如边缘性、跨域性、动态性等,其创作视野、观点、题材与艺术方法都有其鲜明的特色。

整整30多万字的《海外华裔作家访谈录》几乎囊括了目前在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海外新移民作家,其中包括哈金、严歌苓、张翎、陈谦、施雨、苏炜、陈瑞琳、钱少君、刘荒田、黄宗之、朱雪梅、吕红、张慈、沈宁、虔谦、施玮、沙石、陈河、李彦、曾晓文、林涓、章平、庄伟杰、李硕儒、孙博、张宗子、程宝林、虹影、查建英、杨恒均等,访问的作家横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采访的内容涉及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历程、代表作品、创作体会以及新移民文学的发生、发展、形状及前景,涉及新移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比较与关系,兼具可读性与学术性。无论从广度及深度,都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集中对新移民作家的访谈录,为海内外的读者打开了一扇新异的窗口,别具深远的意义。

《海外新移民作家访谈录》的重要特征在于它的深度性:即每篇采访都是在对作家做了深入的研究之后进行的,江少川不仅阅读了作家的主要作品,而且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评论。正因为有此学术准备,在访谈中,笔者与作家不时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对严歌苓的访谈聚焦跨越中美时空的移民文学;张翎的访谈录

指向对华文文学创作高峰的不断挑战;哈金的访谈录探讨小说创作的智性思考;陈河的访谈录聚焦他远行天涯追寻的文学梦等。

回首海外华人的百年历史长河,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道路尤为艰难而曲折,更伴有耻辱的血泪。追溯华语移民文学的历史,最早有书面文字记载的是19世纪中叶的北美劳工民谣。直到20世纪的中叶,不少从中国出去的留美学生,挣扎在“去”和“留”之间,成为海外“留学生文学”的初试啼声。直到20世纪60年代,台湾掀起“出国潮”,涌出一批年轻而成熟的作家,其作品充分表现出留美学生文学所具有的基本特质,在“无根”的精神痛苦中,在“接受与抗拒”的文化冲突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同时在事业、国家、爱情、婚姻的漩涡中走进了“移民文学”的前沿,并创造了海外华语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海外的新移民文学则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滥觞于90年代,经历了由浮躁、粗糙到沉静、过滤的初级阶段,从单纯描写个人沉沦、奋斗、发迹的传奇故事,逐渐走向对一代人命运的反思,对中西文化夹缝里的新移民文化心态的表现,进而对生命本身价值的探讨。

当今世界,东西方文化融合已成为21世纪的主旋律。作为一个变革时代的文学思潮,移民文学的发展之路还将充满荆棘与坎坷。但是,移民浪潮的归来去兮正在为中国文学提供着一股来自海外的涓涓激流。



台湾画家林经哲水彩画作品
HUA XIN